

唐代马球的兴盛及原因

□ 西安理工大学体育教学部 鱼 飞 许万林 曾玉华

摘要 中国古代马球,史籍文献中习作击鞠,也称作击球、打球。《资治通鉴》卷二四四胡三省注释击鞠说:“鞠以皮为之,今通谓之毬。”唐代时由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马球这一休闲活动也兴盛起来,并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欢迎。

关键词 唐代 马球 兴盛

唐朝三百年间,历经19位皇帝,史籍记载喜爱马球的有11位,马球技艺高超的有2位,死于马球事件的有2位。在唐代皇帝中喜爱马球可作为代表的是唐玄宗李隆基,他虽是唐睿宗李旦的儿子,封为临淄王,但是受武氏集团的压制,无权无势,便以打球为务,消磨时光。景龙三年(709)吐蕃派遣使者来迎接金城公主入藏,带来了一只草原上的马球队,技艺高超,先是内院马球供奉与之比赛,“决数都,吐蕃皆胜”。唐中宗很生气,于是下圣旨,令李隆基与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四人“敌吐蕃十人”,在这四人当中李隆基马球纯熟,技艺高超,“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①。李隆基在此次球赛中表现英勇,战胜了吐蕃,得到唐中宗称赞,也获得了羽林万骑的拥护。第二年,韦皇后毒死了唐中宗,李隆基率兵入宫,平定了宫廷政变,当上了皇帝。唐玄宗喜爱马球的事迹被宋朝画家李公麟画成图画,诗人晁说之写了《题明皇打球图》诗:“阖闾千门万户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说“安史之乱”是由沉溺于打马球造成的,则是言之过甚,然而这却从一个方面说明马球是唐代皇室贵族最喜爱的一种娱乐。

唐代皇帝喜爱马球,贵族也喜爱马球,除了史籍中有大量记载之外,也见于文物。在乾县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墓道中绘有《打球图》,群马奔驰,球杖争击,打球场面极为生动。章怀太子李贤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因反对武则天称帝,被流放巴州,逼令自杀。唐中宗复位后,迁葬于乾陵,谥号章怀太子。长安县贵族韦氏墓葬中有打球女俑,新疆吐蕃阿斯塔那王子墓葬中也有打球男俑,都是骑姿英俊,形象逼真。按照古代墓葬的惯例,陪葬物都是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打球图》及打球俑说明这些贵族也是喜爱马球的。

唐代马球兴盛的原因,除了皇帝贵族的喜爱提倡外,还因为马球是军队训练的手段,“伊击鞠之戏者,用兵之技也”^②。“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③。南北朝后期,北方民族以强大的骑兵优势统一了中国,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以骑兵战术夺取天下。骑兵是唐代军队的重要兵种,打马球是训练骑兵的最好手段,纵马奔驰是练习骑术,挥杖击球类似于砍杀,所以唐代各驻兵的营是镇都修有马球场,都是以打马球练兵,这方面最好的文献资料是张建封的《酬韩校书愈打球歌》。张建封以太守升任领兵的徐濠泗节度使,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在马球场上打球,韩愈时为节度使判官,写信写诗给张建封劝他不要打球,张建封便写诗说明原因回答他:“仆本修文执笔者,今来率领红旗下,不能无事习蛇矛,闲就平场学使马。军中拔擢骁智材,竞驰俊逸随我来。儒生疑我新发狂,武夫爱我生雄光。”说明唐代的军队是以马球练兵,带兵的节度使必须会打马球,球场竞驰,才能有骁材更随,武夫拥护。唐代军队马球最为风行的是左右神策军,也是皇帝经常去打球或看球的地方,神策军将个个都是打球高手。“唐制,武选以马上击球较其能否。”^④神策军将的升迁是以打球技

艺高低来决定。“(周)宝强毅未尝意于人,官不进。自请以球见,武宗称其能,擢金吾将军。”^⑤唐僖宗广明元年(880)西川节度使空缺,唐僖宗令“作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罗元杲、牛勳、陈敬瑄,敬瑄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⑥。球技高超便可以升将军,升节度使,这是何等诱人的奖励,平民和兵士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参加到马球运动中。唐人李廓有一首《长安少年行》诗:“长棱出猎马,数换打球衣。”狩猎和打球都是当时少年人的时兴活动,一天可以数次换衣上场打球,可见马球在社会上开展的普遍了。

唐代马球打法是對抗性的竞赛,球场很长,“筑场千步平如削”(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打球筑场一千步”(陆游《有感走笔作歌》)。球场地面平坦,“广场维新,扫除克净,平望若砥,下看犹镜。微露滴而必闻,纤尘飞而不映”(《温汤御球赋》)。这是较正规的球场,一般的球场也必须是地面平整,寸草不生,更有豪华的是“注膏筑场,以利其泽,用功不訾”(《新唐书·外戚传》)。唐代的球场是一千步长,一步约合五尺,合现在一千五六百米。如此大的球场以油膏建筑,其费用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但各军驻地的球场都建筑得更大,不只用于打球,平时军队的检阅,外来军队的住宿,以及大的集会,都要在球场中举行。唐武宗时徐州宣武军卒庞勋率众造反,皇帝派使者康道隐宣慰,“(庞)勋郊迎,旗铠矛戟亘三十里,使骑鸣鞞角,声动山谷。置酒球场,引道隐阅其众”^⑦。球场能容纳几万人宴饮,绝不只是几千平方米的地方,还要更大。球场是开展马球运动的基础,由球场数目可以知道马球开展的大概。唐代除各军驻地有马球场外,据徐松《两京城坊考》考证,唐代长安城内的马球场有十余处,皇宫中也有五六处,但这只是文献的考证,1956年在西安市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了一块奠基石,上书“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太和是唐文宗年号,此球场则不见于史籍记载,这说明唐代马球场实际数字要多于我们从文献中知道的数字。还应该提到的是唐代已有了灯光球场。唐敬宗喜爱玩,曾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至一更二鼓方罢”(《旧唐书·敬宗纪》)。驴鞠、角抵比赛都是要有充分照明的,这一更的夜里是如何进行的呢?五代史籍中便有了明确记载:“(杨)渥居丧,昼夜酣饮作乐,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资治通鉴》后梁纪)吴主杨渥为了夜晚打球,在球场边点燃起几十支十围之烛以照明,其奢侈浪费是惊人的,但也可见其喜好之深。

唐代史籍只说马球比赛竞争激烈,“有碎手折臂者”,“击鞠坠马死”,“以球丧一目”,但未见有具体的打法。《宋史·礼志》记载较为明白,“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余,首刻金龙,下施石莲花座,加以绘彩。……又于东西球门旗下各设鼓五”。球场东西有两个球门,球门有一丈多高,《明皇击鞠图》中的球门是一马之宽。场上球员分成两队,“左朋服紫绣,右朋服绯绣。……御朋打东门”。一队以先得十二筹为胜,“球门两旁置绣旗二十四,每朋得筹,即插一旗架上以识之”。每打进

试论出土遣策的私文书性质

□ 商丘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朝阳

摘要 遣策是丧葬仪式中记录随葬器物、葬仪物品的清单。判断遣策的标准应根据内容,而不是形制。遣策长短宽窄与时代、墓主人身份、物品的重要程度有关。遣策具有私文书的基本特点:用于私人事务、现时性、原始记录性。

关键词 遣策 私文书 出土文献

从20世纪50年代发现遣策以来,自战国至汉晋的遣策已经出土共计60批左右,其中战国与汉代出土的遣策最为丰富。遣策只是出土简牍类文物中的一小部分,但对于遣策的研究已开展了几十年,相关成果众多。但就目前而言,对于遣策的私文书性质,只有李零先生在其著作《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中对所有的出土文献进行分类时,才略一提及:“这里不妨粗做分类:(1)官文书(administrative documents)。分仪典类、占卜类、法令类、文告类、案例类、簿籍类、契约类、书信类等多种。(2)私文书(personal documents)。分占卜类、簿籍类、契约类、书信类、遣册类等多种。”^[1]因此,从私文书的角度对遣策内容、形制以及性质做更为深入的研究与阐释,还是非常必要的。

一、遣策的名称与内容

“遣策”或写为“遣册”,“遣策”一词得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首先由学者叶恭绰提出。1953年湖南仰天湖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这是人们首次目睹先秦竹简之实物,学者们通过对文字释读后认为,这批竹简记载的是器物的名称。叶恭绰先生在为史树青的著作《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所写的序中将其命名为“遣策”,叶恭绰此论一出,立刻得到了各位学者的赞同。从遣策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应该是丧葬过程中所使用的一份物品清单,是丧葬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球得一筹,进十二筹为一局。每队人数并不固定,可以是“四人敌十人”,也可以是十人一队,“如彼击鞠,只是二十来骑,不肯多用马者,亦恶其哄闹也”^[2]。南北地区上场打球的人数是不固定的。为了使场上马驰不会拂尾伤人,马尾都是结扎起来。马球的球是用皮制成,皮球外涂以红色,球如拳头大小。打马球用的球杖是月牙形的,一般用竹木和藤制成,但也有以铁特制的球杖用以伤人。

唐代马球运动已有专用马和专用球衣。“天成元年,西都知府张箠,进魏王继岌打球马七十二匹”(《旧五代史唐书》);“长庆四年,西川节度使杜元颖进蜀画打球衣五百”(《旧唐书敬宗纪》);“数换打球衣”(《长安少年行》),这些说明古代马球运动一直有专用的马和球衣。关于马球的球衣样式,《宋史·礼志》有描述:“绣衣左朋黄襦,右朋紫襦,乌皮靴,冠以华,插脚折上巾。”襦便是通身长袍,窄袖,腰中束带。窄袖是西北民族长袍,乌皮靴也是,即所谓胡服,这是便于于骑马而穿的。章怀太子墓壁画《打球图》中的球衣便是如此装束。唐代马球竞赛场上有鼓乐伴奏,以鼓舞士气。唐代马球场上皇帝打进球呼万岁,群臣打进球则唱好,都要击鼓。鼓乐是龟兹乐,也就是胡乐。唐代马球场上的胡服和胡乐,可以表明唐代长安城中生活的“胡化”程度。

唐代马球场的奢侈豪华还表现在女子骑驴打球上,剑南节度使郭英义“聚女人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旧唐书郭英义传》)。骑驴打球是因为驴身较小,性格温顺,速度不快,容易控制。但唐代男子也有骑驴打球的,这可能是平

遣策是丧葬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简牍文字资料。随着遣策实物的陆续出土,针对遣策的具体用途的争论也日益激烈。有学者认为遣策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物的清单和部分亲友助丧的礼品单,有的认为遣策是他人赠送物品的登记册,还有的学者则认为遣策是针对送葬物品的遣送物品的记录。那么遣策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在整个丧葬仪式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说明遣策作为私文书在丧葬过程中的作用及性质。

记载物品清单的丧葬文书不仅有遣策,还有赠方。许多考古报告将它们统称为“遣策”,其实遣策与赠书的性质是不同的。《仪礼·既夕礼》云:“书赠于方,若九,若七,若五。”至于为什么将“赠”书之于“方”,贾公彦认为“此言书遣于策不同者,《聘礼》记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以宾客赠物名字少故书于方。”可见,“赠方”上面应该记载的是宾客送来的助丧用品,传世文献认为因助丧物品较少而单独记载于方(出土实物显示并非如此,此点将在下文详细阐释)。丧礼是死者与死者家族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因此吊丧与助丧者需要及时奔丧与赠送助丧之物,这是丧礼中极其重要的礼仪组成部分,故《荀子·大略》中云:“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吉行五十,奔丧百里,赠赠及事,礼之大也。”

民和军士买不起马,只能骑驴了。《旧唐书敬宗纪》记载:“郢州进驴打球人石定宽等四人。”骑驴和骑马打球都属同一类型打法。除此之外,唐代尚有不骑马也不骑驴的步打球,则是在马球方法上的演变了。王建《宫词》:“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皇宫中的步打球是在寒食节进行,也是一种民俗活动。《宋史礼志》在描述了马球礼仪之后,又说:“又有步击者,乘驴骡击者,时令供奉者朋戏以为乐云。”步打球的性质与马球已有了差异,而其进一步发展则是古代的捶丸了。

唐代的马球场是贵族娱乐和军人练武的地方,在封建社会政治斗争残酷的时代,马球场也就成为政治纠纷和夺权谋杀的地方。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与淄青节度使李宝臣是亲戚,“宝臣弟宝正娶承嗣女,在魏州,与承嗣子维击鞠,宝正马驰触杀维,承嗣怒,鞭杀之。由是交恶”^[3]。由于这次马球场事件造成两家之间十几年的混战。唐宣宗李忱是唐武宗的叔父,深受武宗的忌恨,“一日,会鞠于禁苑间,武宗召上(宣宗)遥睹,瞬目于中官,仇士良跃马向前曰:‘适有旨,王可下马。士良命中官,出军中,奏云:落马已不救矣’”^[4]。不是仇士良相救,唐宣宗便要谋杀于球场上了。唐末,藩臣强大,王室衰微,朱温命其子朱友伦宿卫京师,监视朝廷,“(友伦)因出宾击鞠,坠马而卒”(《旧五代史梁书》)。朱文大怒,杀大臣及同场打球者数十人。

参考文献

- [1]《封氏闻见记》
 - [2]《温汤御球赋》
 - [3]《宋史礼志》
 - [4]《吴越史武肃王》
 - [5]《新唐书周宝传》
 - [6]《资治通鉴僖宗纪》
 - [7]《新唐书康日知传》
 - [8]孟珙《蒙鞑备录》
 - [9]《旧唐书李宝臣传》
 - [10]尉迟偓《中朝故事》
- ★作者许万林、曾玉华为西安理工大学体育教学部教授。